

黄侯兴

主编

YUELIANGHE CONGSHU

LANGMAN SHIREN DE QINGAI XIEZHEN

丛书

月亮河

GUOMOREN DE

NUXING SHIJIE

浪漫诗人的情爱写真

—— 郭沫若的女性世界



黄侯兴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Y U E L I A N G H E

C O N G S H U

YUELIANGHE

月亮河
浪漫诗人的情爱写真

——郭沫若的女性世界

黄侯兴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漫诗人的情爱写真/黄侯兴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1

(月亮河丛书/黄侯兴主编)

ISBN 7-215-05121-8

I. 浪… II. 黄… III. 郭沫若(1892~1978) -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1961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印张 10

字数 240 千字 印数 1-4000 册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1961年春，在海南岛拍摄的全家福。左起：
平英、汉英、于立群、民英、郭沫若、世英、庶
英及建英。



郭沫若、于立群和前来作客的陈毅、张茜在北戴
河疗养别墅——东一路4号。



郭沫若、于立群
1938年在武汉。



1945年夏季，郭沫若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赴苏联访问，图为临行前与于立群和孩子们汉英（后左）、庶英（前左）、世英（前右）、民英（前中）的合影。

1948年11月底，郭沫若与在香港各界民主人士同船北上，赴东北解放区。图为郭沫若与家人临别前在香港的合照。



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时的郭沫若。



1923 年间郭沫若与安娜及孩子们的合影。



1937 年夏，郭沫若回国前在日本与家人的最后一次合影。



1912 年，郭沫若在成都。

总 序

从广义上说,爱是一种发自人性本能的激情与力量,它把来自不同的民族、家庭和社会的人维系在一起。人们来到地球的一个小小的角落,靠爱得以生存和欢乐,享受人世间的温馨。有人说“爱是第二个太阳”,也有人说“爱是生命得以延续的原动力”。但是,这套丛书想和读者讨论的不是人世间广义的、普泛的爱,而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性爱。

德国诗人席勒(J. C. Schiller)说过:“推动世界的乃是饥饿与爱情。”饥饿与爱情是社会进步的两股驱力;肚子饿了要吃东西,这是人得以存活的条件;男女萌生爱情而结合交欢,这是生命得以繁衍的基础。

当一对恋人走进爱的“伊甸园”的时候,他们仿佛扬起了风帆在海上漂游;她是夜空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他是擅长驶进女人港湾的船员。男人与女人的爱,是共同驾驭与融合,也是彼此疯狂与蕴藉的一体化。驾驭——融合,疯狂——蕴藉。只有这阴阳两极的对立与互补,才可能共同营造一个爱的艺术的殿堂,一个欢乐和谐的爱巢。当然,爱情不总是浪漫和刺激,它需要有一个归属以及相互间的承诺与尊重。

男女相悦,人性之大本。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114746/05



洗礼以及近代西方性文化的影响,中国年轻的文学家开始对儒家道德规范和封建传统习俗发起了挑战。文学家的心灵是最敏锐、最自由的。当他们挣脱了旧日的锁链以后,便以一颗诚挚的、沸腾的甚至是癫狂的心,向他们的恋人袒露那份铭心刻骨的情爱。正像徐志摩要为自己和恋人的神秘而隐逸的爱筑起一堵墙那样:“就使有一天霹雳震翻了宇宙——也震不翻你我‘爱墙’内的自由!”爱是排他的,爱因封闭而圆满而坚固。

文学家所拥有的女性世界,他们所涌起的情感的潮水,要比常人多出好几倍。他们时而畅饮爱的琼浆而舒爽,时而饱尝爱的苦酒而悲怆;思绪的奔突,或喜或怒,或乐或哀,都融在了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的大千宇宙中。

读者只要看胡适、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徐志摩、梁实秋等文学家的狂热浪漫的爱,便能感受到两性间情爱性爱的那种沉甸甸的分量。

当然,无论是琼浆还是苦酒,女性的魅力,女性潜在的伟大力量,都会激发正在热恋的或失恋的男性作家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给他们带来鲜活的创作灵感。许多能震撼读者心灵的作品,正是他们在被“小天使”的爱或不爱弄得神魂颠倒时创造出来的。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所描述的文学家的爱情故事,种种放浪形骸、乐不思蜀、红豆相思、缠绵悱恻、委婉曲折、起伏跌宕的情感交流与撞击,都会给读者一道亮丽的或凄迷的美感享受。而且透过这些或喜或悲的爱情故事,读者还可以从一个侧面去窥视 20 世纪上半叶这几位中国著名的文学家的人生观、婚恋观与价值观。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是那一代人的情爱心声。

黄侯兴

2002 年 3 月 7 日

修订本绪言

这本书(原书名《郭沫若的女性世界》)自1996年问世以来,一些相识的朋友或不相识的读者,在交谈中或在书信中,除了称赞我对郭沫若作了有血肉的人性描述,真实地写出了郭沫若文化品格坦诚的一面外,也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如:“你这样写会不会损伤郭沫若的形象与人格?”“郭沫若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关于女性及情欲的描写,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精神吗?”言外之意,一是批评我没有“为贤者讳”,二是批评郭沫若留学日本及流亡日本期间的一些著述,有悖于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

我以为,这类问题的提出,恰恰说明了观念化、制度化了的儒家文化,绵延几千年,至今仍严重地钳制着中国人的头脑,以致使多少中国男人女人从精神到肉体发生了萎缩,几乎丧失了做人的活气。

中国古之儒者不作兴谈女人,更不作兴谈性,似乎女人与性都是肮脏的、猥亵的东西。男女间的性接触,只是为了“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倘若把文人与女人与性扯在一起,简直就是对文人的亵渎了;尤其是像郭沫若这样中外驰名的文人学者,



写他的业绩,更应该回避他和女人及性爱的事。

然而,男女相悦,人性之大本,种族之繁衍由是,人性之进化由是。文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俗,他们同样需要情侣,需要过着同普通人一样的正常的性生活。儒教的遏抑与防范,只能使人(尤其是敏感的文人)的性格扭曲,个个成为性变态者。

郭沫若早在1921年就说道:“我国素以礼教自豪,而于男女间之防范尤严,视性欲若洪水猛兽,视青年男女若罪囚,于性的感觉尚未十分发达以前即严加分别以催促其早熟。……然而年龄愈进,防范愈严,于是性的焦点遂移转其位置而呈变态。数千年来以礼教自豪的堂堂中华,实不过是变态性欲者一个庞大的病院!”(《〈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

我很欣赏郭沫若对封建礼教从性学角度进行揭露的勇气及其超凡脱俗的见解。这个“变态性欲者”的“大病院”,到底容纳了多少中国男人与女人,恐怕很难得出精确的数据。在这个羞于谈性的国度里,即使是专门从事社会学、性学研究的学者也是无法调查清楚的,但可以肯定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关于中国人的性压抑、性变态问题,同本书内容有关联的是以下三点:

一、儒教的遏抑、防范愈严,就愈加引发少年男女对异性的神秘感与好奇心,催促其性的觉醒与早熟。我相信,从身心发育情况来看,中国城市多数少男少女是性早熟者,并非如有人说的是性迟钝者、性愚蒙者。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西风东渐,更是如此。只是多半羞于承认罢了,或认识上还较朦胧罢了。

二、儒教残酷的遏抑与防范,使许多中国女子在性生活上成了性冷者。“三从四德”、“妇者服也”等古训,是套在女性颈项上的一根锁链,迫使她们在家庭生活及两性关系中始终处于屈

辱的、服从的、驯顺的地位。男人可以一夫多妻,她们却必须“从一而终”。她们把房事看成是男人单方面的享受,是自己对丈夫应尽的义务,以及为夫家履行传宗接代的使命,女人成了泄欲的工具和生育的机器。

其实,夫妻房事,为妻的理应也共同享受性的愉悦。须知在性交时女性性欲高潮是灵长目动物中独一无二的现象。西方女子在性交时倘若没有快感与高潮,就会去找妇科医生或心理医生诊治。中国女子却把它看得很平淡,不少女子对自己从未有过性快感这一事实处之泰然,不以为憾。

辜鸿铭先生在《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一书中说:

“在中国,理想女性并不要求一个男人终其一生去拥抱她和崇拜她,而恰恰是她自己要纯粹地、无私地为丈夫活着。……事实上,在中国正是妻子的那种无我,她的那种责任感,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允许男人们可以有侍女或纳妾。”

辜先生传承了儒教之衣钵,把中国女子被迫承担的“无私”、“无我”,称作是“忠诚教”、“是美德”。这显然是几千年来男性中心社会不断重复的历史话语。

至于中国男子,在儒教的遏抑与防范下,多数成了性无能者或性能不足者。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封建礼教与传统习俗的束缚,精神负担过于沉重的缘故。所谓“男女之大防”、“戒之在色”、“养其发肤”、“存浩然之气”、“万恶淫为首”、“存天理,灭人欲”等教训,像一根根无形的绳索、鞭子,捆住他们的手脚,鞭挞他们的灵魂。男的生怕沉迷女色而伤元气(即伤“浩然之



气”);女的一则担心丈夫伤元气而感到负疚,一则视性交为污秽而不悦。这就导致了多数男性阳痿、多数女性性冷的不正常现象;夫妻双方都存在着性功能障碍——阉割情结,是被“阉割”了的一对伴侣。

三、在儒家文化的熏染与道德统制下,中国自古以来的夫妻关系,说不上是以情爱为连结点,多数是没有爱情因素的“捆绑夫妻”。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成的夫妻,从情感到性交都不具有爱的文化内涵。真正达到两性心灵沟通以至于性事达到和谐融合的完美境界,被捆绑着的男女只有在婚外恋中才可能实现,才可能体验到“异性相吸”的种种审美愉悦。

一位从事社会学、性学研究的学者指出:“近十几年来,虽然随着国门的打开,社会风气比过去开放了许多,但对于过去几千年儒教文化和几十年革命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禁欲氛围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①如果我们可以认同这一观点,承认这一事实,那么,中国男人女人(尤其是偏远地区乡村的男人女人)要想冲破禁欲氛围,实现性文化观念的转变,就非一蹴而就的事,恐怕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正因为如此,郭沫若在他的自传和部分书信、散文、小说中,敢于谈女人,谈性,谈他自己的情感世界与肉身欲望,应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受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影响的积极表现,是对既成道德规范的挑战,对中国封建礼教习俗的蔑视,也是对人的主体意识与生命价值的肯定,迄今仍具有相当前卫的文化观念意义。郭沫若曾经热情称颂《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我们何尝不可以拿来套用于郭沫若的这些著作呢!

^① 李银河:《中国女性的感情和性》,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我在初版本“跋”中说过,郭沫若把自己的人格、灵魂及其对女性的爱慕向读者公开,是不计功利得失的。在他已是享誉海内外文坛、学界的巨擘,却仍然如此勇敢、坦诚地写出自己的爱,更令读者敬佩不已。几部自传不仅没有损害郭沫若的形象与声誉,相反地加重加厚了当代青年对他尊敬的分量。

在跨进 21 世纪之际,我想我们这些受过儒家文化束缚和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一度出现的极左思想的熏陶而今已是知天命或古稀之人,同当代青年的主要差距、差别在哪里呢?

差距、差别在于悟性。

当今顿悟了的青年男女,不愿意仰视那些历史的或现实的伟人、名人。“万岁!万万岁”一类的口号,在他们听来感到很刺耳。他们在保持自我人格的独立与尊严以及务实的心态时,要求与伟人、名人平等对待,起码不是君臣父子的关系,他们敢于对伟人、名人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在承认他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创造的某些业绩的同时,也敢于对他们的人生坐标和“豪言壮语”提出质疑。然而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却驱赶不走伟人、名人在自己心中的偶像地位,习惯地给他们头上罩上一个灵光圈。

我们这些在旧轨道上走惯了的人,总是因袭古来史家治史立传的方法,重歌功颂德,隐去他们的局限与过失,回避他们的私生活。“为贤者讳”成为我们这一代人著述必须遵循的戒律,也是我们必须磨练的治史精神。

我之所以努力地要从传统模式中跳出来,是在读了几本外国人撰写的外国名人传记作品(如《雨果传》、《巴尔扎克传》、《歌德传》、《凡高传》等)受到启迪以后,才决定要来尝试着写郭沫若的女性世界。

这几部传记作品都有中译本,读者不妨找来一读。我的感



想,第一是亲切感。立传的对象虽然都是世界名人,作者却没有把他们装扮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既写他们不朽的功业,也写他们人格的种种劣迹。如写巴尔扎克,在肯定他的皇皇巨著的同时,也揭橥了这位曾创作《人间喜剧》的传主自身自私、贪婪、迷信、向上爬等劣根性。因此虽是一代风流,却让我们觉得巴尔扎克也是现实生活中一个普通的人,和我们没有两样,只不过比我们敏感些,又略有文学天才而已。

读我们现代国人的传记作品,只觉得作者用一大套理论原则把传主层层“包装”起来,用彩笔重重地加以美化。作者决不去触及传主的人性复杂的一面,也不敢让读者去窥视传主的另一个生活角落。读这类传记作品,总有一种受骗的感觉。

其次是轻松感。外国人写的传记作品,富有人情味与哲学意蕴,读来饶有兴味。作者仿佛是与亲朋谈心、叙家常,温情脉脉,意趣融融。情感的宣泄,思绪的奔突,或喜或悲,或乐或愁,融在了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的大千宇宙中。它像是山涧涓涓的清泉,在读者心田里缓缓地流淌,给读者以多重的精神享受。中国当代出版的传记作品(如《鲁迅传》、《郭沫若传》、《茅盾传》、《曹禹传》等)则不然,作者写得吃力,读者也读得吃力,只觉得苦涩而无甘味可言。

正是这些说不上是感悟的粗浅体会,促使我要来展示郭沫若的女性世界——在他心中久久燃烧着的对于女性的热情,对于女性的崇拜与痴情,以及他给他的恋人献出的爱。

我发现,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于1949年以前,不全然是图解政治的。不可否认,在甘愿做“留声机器”、做“党喇叭”意识支配下,他写了许多配合社会政治需要的标语口号的作品。但是,女性的魅力也激发了他的不能自己的创作冲动,给他带来了新鲜的创作灵感。这在他的写给安娜的情诗和爱情组诗《瓶》,小

说《残春》、《落叶》、《叶罗提之墓》等,《三叶集》里的书信,屡屡可见。

郭沫若既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位浪漫多情的才子。北伐途中,他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挺进,又在草垛里偷闲与安琳卿卿我我。只看郭沫若的哪一面都将是片面的。因此我在这本书内,自信没有亵渎郭沫若,而是丰富了郭沫若。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在《巴尔扎克传》一书中描写了23岁的巴尔扎克爱上了有九个孩子的45岁的罗尔·德·柏尔尼夫人。这该是何等尴尬呀!但是巴尔扎克承认,“她使我成为作家,她给予我年轻时所至为需要的同情,她指导我的情趣,她像姐妹般哄我啼笑,她每天来到我身边就像一场能减轻人痛苦的安睡”。从1822年到1833年的十一年间,巴尔扎克对这位贵族夫人的爱与忠诚不断地升华。“巴尔扎克在罗尔·德·柏尔尼夫人生前死后所写的关于她的一切,构成了对这位‘伟大、崇高的女性,友爱的天使’的一组感恩戴德的、欣喜若狂的赞美诗。这个女人从她身体内部把一个男人、艺术家和创造者给唤醒了。”

多么伟大的唤醒者呀!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这位贵族夫人的关爱、呵护,就没有巴尔扎克卓绝的艺术创造。她“解放了尚未发现其真正自我的男人,使几乎绝望了的艺术家获得自由”。

同样,把郭沫若从深陷旧式婚姻痛苦的泥潭中解救出来,使他懂得生命的价值、重新找回自我以及由此迸发出诗的创作灵感,写出《凤凰涅槃》等著名诗篇的,是他的第一个恋人、日本姑娘佐藤富子(郭安娜),所以也可以这么说,没有郭安娜给予的东方少女的温馨与关爱,就没有郭沫若诗的创作。这就是女性的魅力,女性潜在的伟大的创造。



再说一遍,在这本书里,我是褻渎了郭沫若,还是丰富了郭沫若,无须我饶舌,聪慧的读者是自会评断的。

2001年3月于北京官园寓内



月亮河丛书